

周德祥 总主编

天下

人生必读丛书

先锋

这是一支战功赫赫的功勋队伍，是生产力中最具核变能力的部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学术与思想的推进与辐射，实业的成百倍发展壮大，中国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家，皆有赖于他们。这群人身上，蕴含着一个民族最该珍视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处一隅而心存全民族、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态，一生埋头奋斗，但求个人创造有补于社稷民生，而不计个人名利回报的品格，还有中国人历来相对缺乏的理性、严谨、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特立独行、不肯趋炎附势的个人气节。这种精神气质无疑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资源，是推动中华民族的科学、民主、文明节节挺进的内在动力。

TIANXIA XIANFENG



任红 主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人生必读丛书

周德祥 总主编

天下先锋

任红 主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下先锋/任红主编.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1

(人生必读丛书)

ISBN 978-7-80714-579-0

I. 天… II. 任…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43448号

天下先锋

甘肃文化出版社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16楼 电话: 8454870 邮编: 73003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mm 1/16

印张: 25.5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28千字

印数: 1~2000册

ISBN 978-7-80714-579-0

定价: 42.5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近两年，有一种经济现象也许值得中国公民们留意：在称雄世界的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之时，后起的中国经济却像一艘马力十足的航空母舰，在动荡的大海上绕过暗礁，劈波斩浪，稳速前进……

自然，我们不必因此而盲目乐观，忽视差距与面临的重重困难，但如果把视野推开一些，我们却能明白，中国出现这种局势，有着深刻的涵义。时间前推100年，那是中国经历了“庚子事变”不久。那时候虎狼环逼，内患四起，国贼覬覦，威威赫赫近三百年的大清国风雨飘摇，气息微弱。由此再往前推约70年，虎门销烟的烈火方炽，英国军舰上发射的炮弹已呼啸而至，古老帝国紧闭的铁门轰然倒塌。从“天朝帝国”的酣梦中惊醒的中国人力推洋务，以图自保。谁料想，标志着洋务运动成就、号称世界海军诸强之一的北洋水师刚建立不久，即于黄海一战中全军覆没！以康、梁为代表的中国士人吁求朝廷变法自强，却落得个六君子绑赴菜市口砍头、康梁流亡国外的结局……

那是一个令后人呼吸沉重的世纪。从1840年至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国这艘曾经有过汉唐华章、康乾辉煌的东方巨船，桅樯倾圮，船舱漏水，持续下沉，下沉……一百多年后，它却顽强地浮出水面，以前所未有的崭新姿容，踏波履险，汽笛长鸣，破浪前行。

中国在重新崛起，中华民族正处在复兴途中，已是不争的事实。

国运昌盛，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扬眉吐气。当此之时，如果要问是谁在推动这艘行将沉没的大船重新上升并加速前进的？我想，中国复兴之始，当从当年救亡之日算起；而其中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一群最先觉醒的有血性的中国人。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以笔为剑、启蒙民众思想的崎岖山路上，你可以看见魏源、林则徐、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鲁迅、陈独秀、李大钊们奔走呼号的身影；在拿起刀枪干革命的阵营中，你可以看见孙中山、黄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无数志士、工人、农民和军人出生入死的身影；在日寇压境的危难时刻，你可





以看见以19路军、29军、八路军为代表的铁血将士们和用地道、地雷等土办法杀贼卫家的百姓们的身影。这几支力量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所付出的牺牲、所作出的历史功绩为人熟知。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一支较少为人注意的力量，那就是几代以科学、教育、实业、学术救国强国的知识分子队伍。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是一群“埋头苦干”的人。这群人对国运的认识很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中国之所以遭人欺凌、濒临危局，深层原因就在于思想、科技、教育、文化、实业、经济远落后于西方人。欲振衰起颓、复兴国家，亟须从培养元气上做起。从鸦片战争中国初受重创之时起，走上这一条救国之路的人就络绎不绝，代代相承。譬如开一代教育风气之先的燕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学术巨擘陈寅恪、梁启超、钱穆、王国维，实业家詹天佑、张謇、荣氏家族，科学家侯德榜、竺可桢，社会学家费孝通，人口学家马寅初，文学家闻一多、茅盾、老舍、俞平伯、钱钟书……在政治动荡、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一群貌似不参与政事、躲在书斋里或生产现场埋头苦干的人们，为中华学术保存了血脉，为中国引进新思想，使中国人开阔了眼界，发展了科学，保存了民族工商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百废待兴，正需这一批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精忠报国。于是，数万名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与国内知识分子相会合。共和国的各路建设大军中，出现了数不清的“拼命三郎”。譬如为人们熟知的华罗庚、卢嘉锡、苏步青、周培源、钱学森、钱伟长、李四光、陈景润、钱钟书、吴晗、谭其骧、白寿彝、侯仁之、翁独健、孙冶方、梁思成……还有更多的幕后人物鲜为人知。须知，这是一支战功赫赫的功勋队伍，是生产力中最具核裂变能力的部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实业的成百倍发展壮大，中国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家，学术与思想的推进和辐射，皆有赖于他们。而它们又清一色的都是那种抱朴见素宁静淡泊之人，于名于利于权皆无兴趣，唯知为事业拼命；历尽劫波而无怨无悔，一腔精忠之心令人肠热。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科技事业中断了十年，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进一步拉大了距离。“文革”结束后，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大批有志青年从工厂、农村涌入大学校园。适逢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激荡中华大地，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而徐迟的一篇《歌德巴赫猜想》雄文，也曾风靡中国……八十年代初的时代氛围，把科学价值本位的观念深深地植入了千百万青年学子的心灵深处。二十多年



之后，这一代学子已茂然成材，他们与上两代知识分子一起，挑起了中国科学技术领域的大梁，成了中国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中国的科技事业在近二十年中突飞猛进，在许多领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国际水平。

对于这几代知识分子来说，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他们的天性；在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上锐意创新，有所建树，是他们的天职；集合个人成就，推动我国生产力以及思想、学术、文化、艺术事业的蓬勃生长，使中华民族重新步入世界最先进、最文明、最优秀的民族之列，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是他们共同的梦想。

这是一群多么可爱的人啊！可惜，在近些年文化业界商业化娱乐化的大潮中，这群无多少商业炒作价值可言的布衣书生们，几乎被公众视听所忽略了、所淡忘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缺失。编者无意为他们扬名——他们本无意扬名——而只是想指出一点：这群人身上，蕴含着一个民族最该珍视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处一隅而心存全民族、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态；一生理头奋斗，但求个人创造有补于社稷民生，而不计个人名利回报的品格；还有中国人历来相对缺乏的理性、严谨、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特立独行、不肯趋炎附势的个人气节。这种精神气质无疑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资源，是推动中华民族向科学、民主、文明节节挺进的内在动力。毋庸讳言，90年代后，在科学文化界，这种精神气质正在被追名逐利的浪潮所包围、削弱和消解；而在更广大的范围内，科学精神正在被忽略、淡化。举一个眼前的例子，人人皆知杨利伟、“嫦娥一号”，但有几儿知道载人航天工程的设计者呢？多少学子攻读博士，但其中有不少人眼睛盯的是职称、名声、钞票、房子、车子，而不是科学本身。多少粉丝对娱乐体育名星的隐私如数家珍，但有几个人是科学家的粉丝呢？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在知识群中的消解，科学的价值在人心中的降低，这是比前一种缺失更严重的缺失。当传媒焦点和民众视线主要被名星动向、政治人物、时尚风潮所绝对占据，而科学创造者以及由他们所代表的科学精神被边缘化、无人关注之时，这对一个民族绝非幸事。从长远来看，这种不很健康的氛围很可能会影响我国科技、学术的发展，从而使国家的崛起减弱后劲。有鉴于此，本丛书才刻意编辑了《天下先锋》一书。该书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科学家、发明家、学者、创业者的朴素形象，也藉此传递了我国科学界的一些新信息。不敢奢望一本书能起多大作



用，唯愿这些学人、科学家、实干家的故事以及全新的科学知识能引起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兴趣。

坦言之，一部书的作用非常有限，故借此书出版之际，我还想说点个人的想法。其一，国外和我国的历史证明，凡是科技成就迭出、人才济济之时，必是社会上形成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之时。因此，希望我们的出版界、新闻界同仁都来关注科研人群，关注那些数十年如一日、寂寞而坚韧地奋斗在鲜为人知的科研、学术领域中的人们的事迹，特别是要弘扬其科学创新精神、爱国精神，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薪火相传，代代相承，而不是就此逐步消解；努力创造一种适宜科学发展、人才生长的气候、土壤。其二、学术腐败、追名逐利以及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的风气正在扩散，杀伤科技人员的信念和创造力，伤害着我们的科研事业，一些体制上的弊端也在束缚科技进步。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难以估量的推动力，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更深入的思想解放，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在口头上高喊解放思想，行动上却被风气所俘虏，另行一套。我们需要真正的思想解放，需要从功利风气、官本位观念中突围而出，重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实践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替代功利主义、物质至上的腐朽价值观；需要改造体制、机制上的弊病，努力营造科学研究的软环境和创新的软环境。

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民族的精英，而占人口比例最大的老百姓则是这个民族的主体。作为一个民族最底层、最基础、最庞大的群体，他们的素质与品格，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素质与品格。和知识分子群体心存社稷民生有所不同，他们通常都是为自己的生计而活着。他们的地位最低，劳作最辛苦，生计最艰难。而生存地位、生存方式往往就决定了他们的素质、品格。编者无意评说中国民众的整体品格，而只是想指出一种事实：在这个活得最艰难的人群中，有一些人却活出了比高高在上的人们高贵得多的品格！譬如《百姓英雄》中《特殊的葬礼》一文讲述的申春玲这个山村小姑娘的人生故事，就足令天地为之动容！的确，这些分布在各行各业、山乡僻地的平民百姓们用生命活出来的人生故事，奇特而真实，常常令人匪夷所思，任是最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也无法想象得出来；也令人感愧不已，觉出卑微者未必卑微，而高贵者也未必真高贵。在编者看来，这些人是百姓中的真英雄，尽管他们都无法留诸史册；有必要把他们

的人生故事，不，是他们金子般的品格，传递给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须知，这些普通人的品格，才是我中华民众的真品格！

世事复杂，人生多艰，因此需要理性的把握，需要人生智慧。在西方人的语言中，哲学就是智慧的意思。为此，编者还邀请了青年新锐哲学家，奉上一册充满智慧的《人生读本》，期望能给读者带来一点人生启迪。

这些就是编者策划《人生必读》丛书的初衷。三册先期出版，不过是投石问路，目前的水准也还未能完全达到预想的目标。效果如何，敬请读者诸君品鉴。

周德祥

二〇〇八年元月



序

目 录

第一辑

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	薛小和 (1)
生命的承诺——医学家裘法祖	贾 蔓 (8)
拯救饥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弱 水 (15)
长者如山——忆黄昆	秦岭枫 (21)
中国神经科学奠基人之一张香桐	张元武 (26)
揭开制碱秘密的化工学家侯德榜	曹海英 (32)
走近著名文字学家张颌	张旭东 (39)
实验物理学大师丁肇中	纪 涛 (43)
“黄土之父”刘东生的黄土情缘	尚艳玲 (47)
以心持炬，光熠星河——记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	刘 子 (51)
近距离看吴孟超做手术	贾 蔓 (56)
卢伟民：美国城市规划界的华裔大师	文爱平 (62)
黄祖洽的幸福生活	秦岭枫 (69)
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	冯春萍 (74)
吴良镛：让人类诗意地栖居	文爱平 (87)
实在人张开济	陈 琛 (95)
遥望茅于軾	岑 科 (100)
当代毕昇——王选	丛中笑 (105)

第二辑

徐刚：中国环境文学之父	阿贝尔 (114)
翻译家杨宪益的风雨人生	贾 蔓 (119)





任继愈：天风海浪自悠悠	邢宇皓 (126)
段文杰：梦萦莫高窟	谢志娟 (133)
张锦秋：长安寻梦	文爱平 (142)
“不务正业”的音乐家——谭盾印象	朱 慧 (148)
刘索拉：搭上命把声音抛出去——与刘索拉对话	李宗陶 (155)
史成礼与敦煌性文化	阿 凡 (161)
西夏泥活字第一人：孙寿龄	宋振林 (167)
亚洲电影新势力之贾樟柯	苏七七 (172)
章开沅：为南京大屠杀取证	林伟萃 高 峻 (176)
木心：我是绍兴希腊人	李宗陶 (185)
小八路出身的剧作家武玉笑	管卫中 (190)
方永刚的力量之源	陈万军 白瑞雪 郭 嘉 黄庆畅 (196)
犹在镜中：记郑大圣	苏七七 (204)

第三辑

中国炼油第一人金开英	陆 剑 (209)
“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	杨旭民 (218)
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	李彦春 (224)
妻子眼里的杨利伟	余 玮 (232)
王永民的王码人生	王军华 (239)
为青藏线探路的“拼命三郎”李金城	李彦春 (245)
感动中国的桂希恩	秦岭枫 (252)
素描李登海	董 书 (257)
大蒜素N之母刘锡云	李幼谦 (261)
生发专家赵章光	王 琰 (266)
“抓斗大王”包起帆	韩银梅 (271)
工人发明家刘幼生	莫春强 (276)
吴玉录和他的机器人王国	顾 阳 (282)
刘务林和他的野生动物追寻之旅	徐锦庚 (287)
航管专家陈志杰和他的“融合”思路	冯春梅 (293)
农民发明家邵德子	叶 梓 (300)

第四辑

甘肃“农家书屋”：星火正在燎原	王立强 (304)
《读者》的故事	一 民 (310)
孩子王霍懋征	王 峰 (319)
林艺：中国民间性家教第一人	陈 璐 (323)
潘石屹：站在SOHO上的舞者	段 存 (328)
梁子：独闯非洲的中国女人	李京华 (333)
“老干妈”陶华碧传奇	李 榕 (338)
“谭木匠”的故事	陈 东 (344)
马云：凭啥笑傲网络江湖	段 存 (349)
赵琦玲：一只在软件业翩翩起舞的蝴蝶	陈 科 (355)
陈良刚：让地球上的人用上干净的水	李 强 (359)
吴文良：有机食品播种者	唐 哲 (366)
黄鸣：以太阳能梦想经营人生	黄秋丽 (371)
施少斌与“王老吉”	吕 萍 (377)
王有德和他的治沙路	杜峻晓 (383)
她，与信念同行——追记全军首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黎秀芳	张 倩 (389)





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

薛小和

父亲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又坚持了四年多的时间。这四年，父亲全身退出了尘世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

用吴敬琏老师的话说：薛老被隔离了。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在护理他之余，我时常看着他那佛陀般安详的面容，想，他还在想什么呢？想起他的前任秘书李克穆常说的：薛老是神仙级的人物。神仙的意境又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就是这样平静如水的生命状态？

“牢狱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

吴敬琏老师说，我父亲从30年代研究经济学，中间经历了相信计划经济，后来又力主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的漫长过程。

父亲从小天资聪慧，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16岁时因家境败落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期间，父亲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6个月学完的会计业务。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父亲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他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父亲，休假去了。

多年来，父亲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另一方面是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我觉得父亲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聪明、勤奋、持之以恒外，遇到陈翰笙这样一位启蒙老师是他的幸运。陈翰笙在研究问题方面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父亲跟随他，从一开始



就是脚踏中国的农村，从调查实际情况出发，扎扎实实地研究问题。有人曾奇怪，怎么父亲这一代经济学家多是江苏人？那是因为陈翰老带出了一批人，除了父亲外，还有孙冶方、钱俊瑞、姜君臣等。解放后，父亲的职位已比陈翰老高许多，但是，凡与陈翰老一起开会时，父亲绝不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老坐中央，而且张嘴讲话，第一句肯定是：“陈翰老是我的老师。”

父亲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一位曾在英国攻读经济学的博士对福特基金会的美国人说，你要想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你就必须读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父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实际工作和不断的调查。说起来别人也许不会相信，父亲这个大经济学家在“文革”前从未读过《资本论》这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他是在“文革”期间关在“牛棚”及在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读的。我们家里有很多经济学的书，但父亲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他写作时，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纸、一枝笔，就是一本统计资料。到外地去写书，就带半箱子稿纸，一把笔，一本统计资料，所要写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在1975年恢复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老牌“计委”对计划经济的批判

父亲最具有学者风范的是他勇于否定自己的观点、不断思索、不断追求的精神。1948年在西柏坡时，他就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文革”被打倒，他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计划体制呕心沥血。正因为如此，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会。17年间，他曾有过两三次对计划体制非常委婉的批评，但都因形势所迫，一露头就收了回来。即便如此，他还是付出了一些政治上的代价。1976年“文革”结束后，父亲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后，更是亲身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担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同年夏天，由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



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和父亲代表体改办在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做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父亲这个老牌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站出来批评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也使这种批评和否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起步，重新思考。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对于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治学精神，吴敬琏老师有着非常经典的概括。吴老师在1994年10月召开的“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上有一个书面的贺词，贺词说：“您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的体验，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发展，更由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然而您从来不凭感觉办事，也从不固守老经验。我感到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即使到了70开外的高龄，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使您的思想始终站在我国理论界的前列。到了耄耋之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您在1990年针对当时保守思想回潮写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这两篇宏文，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您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认真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我很想做个学者但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父亲



回答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确实，父亲自加入共产党那天起，特别是30年代后有了学者身份、40年代后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以后，一直是给自己这样定位的。这种定位使他70多年来，始终把党和人民、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自己的命运如何，都与党的事业荣辱与共。但是，在信念坚定的同时，这种定位也给他造成很多矛盾，特别是当他的理论观点与党的正式文件不协调的时候，这种矛盾甚至会导致痛苦。

1982年5月至9月间，按照当时国务院领导的授意，为配合党的十二大的理论准备工作，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型理论讨论会，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参加讨论会的有300多人，累计召开大小讨论会不下70次，讨论历时4个月。会议开始时是在十二大以前，9月份十二大召开后，这个讨论会于9月底结束。理论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众所周知，父亲的理论观点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的，而当时的中央精神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父亲知道自己是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与中央保持一致，所以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凡是公开发表的文章都遵守了中央当时的提法，自己的一些不同意见只是在允许的范围内以补充解释的形式提出。但即便如此，在1981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一份材料中，他还是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受到批评。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受命组织这个讨论会感到非常为难。当然，为难归为难，对于父亲这个老共产党员来说他只有一种选择：在5月4日的动员报告中，父亲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这个说法有毛病”，但他同时向大家提出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希望大家敞开讨论。

我猜想这种矛盾决不止一次，这只是比较典型的一次，应该还有更痛苦的。我记得在“文革”后的1978年初，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但党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在2、3月间，父亲去参加五届人大，听罢当时国家计委领导作的计划报告，父亲回到家中非常生气，以致拍着椅子的扶手失声痛哭起来。他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报告还是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里，不讲政策，不图指导方针的改变。我当时在工厂做工，对父亲说的不大懂，不知该怎样安慰他。以父亲那样平和、内向、长于忍耐的性格，急到痛哭的地步真是急到了极致了。因为急，所以“文革”后一恢复工作，他就到基层去调查，摸清国民经济的情况；因为急，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闭幕，他就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呼吁改



革旧的经济体制。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开始正常了，但父亲还是因为他的改革主张受到了几次批评。有党组的正式批评，也有多年的老领导的不满甚至将父亲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尽可能地坚持了他的主张，很多时候是在忍耐和等待中坚持的。

习惯从经济运行中获得结论

在党的纪律和个人观点的矛盾之间，父亲无论如何退守，都尽量坚守着一条底线，那就是实事求是。父亲是通过社会调查迈入经济学的大门的，所以，几十年来他已养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考方式和研究作风。阅读他的报告和文章可以看出，他的思路几乎成了一个定式，讲一个问题先讲现在的实际情况，再讲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及政策演变过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他在1982年7月给张劲夫同志的信中，对《物价管理条例》中仅把“稳定物价”放在首要地位、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先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物价情况，理解“稳定物价确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的原因，再叙述了从1950年以来我国物价政策是怎样在“稳定”和“调整”二者之间把握的，在物价上涨时着重于“稳定”，在物价趋稳时着重于“调整”，指出“《条例》不是《暂行办法》，应该看得远一点，说得全一点”，“不提合理调整物价是不完全的”。

与许多习惯于从理论推导中得出结论的经济学家不一样，父亲更习惯于从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注重概念，遣词用句也不大准确，他注重的是实际运行过程和结果，注重从实际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到处呼吁改革，几乎都是从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讲起，他从20多年的曲曲折折中得出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结论，深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80年代他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也是历数近七八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甚至追溯到“大跃进”时期和山东解放战争时期的情况，提出应该“管住货币、放开物价”，而不是“管住物价、放开货币”。

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知识分子特性融合

学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共产党人则要改变世界。由于父亲



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他对社会经济现实总是保持介入的状态，始终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事业。有人很奇怪，父亲这样一个老计委，怎么能如此坚定地主张商品经济。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这种结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父亲像所有他们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个人经历、观念、性格上的局限性，也犯过不少的错误。父亲就说过：“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现在看来，建国以后我在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一些就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是当时屈从于政治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他虽然是杰出的时代人物，但他从来对自己都有非常清醒、冷静的认识。

在我看来，父亲固然是共产党人，但他更是智者，在他身上有着较强的知识分子特性：

——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虽然有时他处于“沉默”或“失语”的状态，但他对事物从来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判断；

——他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思想，他对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带有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他不是举重若轻的战略家，他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 and 人民谋福利的实干家；

——他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当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绝不会认为自己比党高明，他对党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对权力的屈从，而是对真理（当时认为是真理）的认同，或是以大局为重的自我牺牲，事后，他也绝不会为个人恩怨去算历史旧帐。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亦儒亦吏、亦官亦学一直是一个传统。但在我国第一代的领导干部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父亲就是身上带有浓厚知识分子特性的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知识分子特性在他身上的融合，有时引发矛盾，有时生成痛苦，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升华。